



ENTERPRISE MIGRATION
BEHAVIOR ON WHOL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

◎ 申恩平 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ENTERPRISE MIGRATION
BEHAVIOR ON WHOL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

申恩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 / 申恩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8-08209-9

I. ①金… II. ①申… III. ①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950 号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

申恩平 著

责任编辑 杜希武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2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209-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摘要

首先统计分析了东中西、不同省区之间企业分布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区域非均质性是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差异性的根源,这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整合区域要素,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小企业集群。

其次,分析了浙商外迁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规模分布及其发展态势,发现沪、苏、赣成为浙江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详细阐述了深圳企业外迁的态势,并比较浙沪苏投资环境,具体罗列出闽东南地区和西部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

通过对企业总部内涵的分析,我们发现企业总部一般具有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运营、业绩管理和外部公关等职能。另一方面,企业总部外迁具有很大的风险,迁移活动也会打破企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内部和外部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外部利益集团之间原有的利益平衡体系,这些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途径对企业总部迁移行为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干预,阻止企业的迁移实施。

再次,通过推理的方法,探讨了当厂商生产制造基地外移时,如何重建其母国的供应关系。企业跨区扩张可以通过企业内地域分工突破行政壁垒、降低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增加区域共同利益,促进统一市场的建设,从而深化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最后,对金融危机下浙江制造业厂商迁移的普遍现象,找出了影响制造业厂商迁移区位选择的因素,利用实证研究所获得的区位影响因素来分析浙江各县区的相对投资优势。内容包括:(1)统计分析2001至2005年浙江制造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变迁;(2)决定影响制造业厂商区位选择的因素;(3)对总体制造业与都市劳力型、都市技术型、基础资源型及地方资源型等四大类制造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做分类研究,具体包括:影响总体制造业厂商投资设厂的因素;影响四大类型制造业厂商投资设厂的因素;制造业四大类型主要分布的地区分析;(4)具有投资优势的地区分析。浙江要抓住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迁移的机会,研究各县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吸引其他企业迁往浙江,平衡迁入区和迁出区的资源差异,对解决资源竞争问题,开发地方资源、实现地方经济转型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本书内容系统性强,研究角度新颖,不仅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从事区域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参考借鉴,而且对企业界决定企业迁移区位选择的管理人员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前 言

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多企业因为客户减少或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企业利润减少,纷纷裁员,有的则倒闭,特别是出口导向的企业。

在长三角经济圈及珠三角经济圈,外资生产型企业最多,这次受影响也最大。现在很多外资或内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准备迁移,有的迁移至越南等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东南亚国家,有的则注重中国大陆市场而打算迁移至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省份。

面对此次企业迁移潮,中国内陆省市应凭借自身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低的优势,加大招商力度,可以派遣人员前往苏南、上海、珠三角等长期驻扎,争取那些打算迁移的企业来本地注册公司。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大有利益。

我们的招商思维应该应形势而变,除了走出去,吸引国外的企业来投资注册公司,还要在国内加强招商力度,吸引那些准备迁移到国外或内路省市的企业。内陆各省市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主导产业方向等,鼓励那些与自身发展相符合的企业来投资,切不能因为招商而不管什么企业都招来,特别是污染严重的企业。

据初步调查,目前,浙江省共有 3058 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 488 家,总部迁移 2488 家。共有 4207 家企业在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 1675 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 1964 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 226.3 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 453.5 亿元。

最近开展的企业迁移及投资环境调查结果表明,上海、江苏、江西等省市已经成为浙江省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因其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交通优势和信息优势,成为浙江省企业外迁的首选地区。在 196 家已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企业选择上海为迁入地。从迁移类型看,在总部迁移企业中迁到上海的最多,占 88.9%;在研发基地迁移的企业中迁到上海也最多,占 71.4%。可见,浙江省企业整体外迁到上海和去上海投资办厂,以及把生产基地迁入上海的比重要明显低于总部迁移和研发基地迁移这两种迁移类型。

江苏与浙江省同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较强,区域优势比较明显,而一些生产要素如土地、电力供应成本低于浙江省,也是浙江省企业外迁的主

要区域。调查显示,以江苏为迁入地企业占14.3%,迁入量在各省市中位居第二。迁移类型集中在投资办厂和生产制造基地迁移。

江西和浙江省山水相连,人文相近,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和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以及当地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优惠,吸引了不少浙企将生产基地迁至江西。江西已成为浙江省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企业迁入量仅次于上海和江苏,位居第三,迁入企业数占12.8%。

浙江省企业外迁的其它区域,以迁入量多少排列,依次是广东、山东、福建和北京;调查结果还显示,浙江省企业迁入西部地区要明显多于迁移到东北省份。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围绕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这一主题,分析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浙商外迁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规模分布及其发展态势;分析沪、苏、赣、深圳企业迁移的态势;归纳闽东南地区投资环境、西部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再通过推理的方法,探讨当厂商生产制造基地外移时,如何重建其母国的供应关系;给出企业跨区扩张的条件和路径;提出中国内陆省市要抓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迁移的引导机制。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引用很多的管理理论、研究论文的思想和观点。在总结以往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在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典型地区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地、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现将近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著成此书,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探讨,希望能对我国的企业迁移理论、方法和实践有所贡献。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宝贡敏教授、沈阳工业大学张青山教授、浙江万里学院闫国庆教授、鞠芳辉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核成教授、钱昇教授、王晓云教授、于剑教授、李道国教授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另外,第10章实证研究部分得到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决策科学与创新管理”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的资金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书中肯定有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和同行们斧正。

著者

2010年12月

于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目 录

第 1 章 企业迁移概念与理论发展	1
1. 1 什么是企业迁移	
——关于企业迁移概念的理解	1
1. 2 企业要不要迁移	
——几种理论观点的回顾	3
1. 3 企业为什么要迁移	
——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	6
1. 4 企业如何迁移	
——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分析	10
1. 5 企业迁移研究现状	13
第 2 章 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16
2. 1 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	16
2. 2 民营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19
2. 3 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	21
2. 4 民营企业主阶层状况	23
2. 5 民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	26
第 3 章 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30
3. 1 区域分布差异	30
3. 1. 1 东中西三大地带企业分布状况	30
3. 1. 2 不同省区之间的企业分布状况	31
3. 2 地区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31
3. 2. 1 东中西部企业发展差距的比较	31
3. 2. 2 湖北与东部地区企业发展的比较	33
3. 3 影响地区差异的因素分析	35
3. 3. 1 地理区位和经济体制存在差距	35
3. 3. 2 中小企业发展结构差异	36

3.3.3 发展环境的差异	37
3.3.4 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地区差异	37
3.3.5 人力资源的差异	38
3.4 企业发展地区差异性产生的根源	39
3.4.1 企业发展过程	39
3.4.2 企业发展地区差异性产生的根源	43
第4章 企业迁移的态势与投资环境差异	45
4.1 企业迁移的态势	45
4.1.1 浙商外迁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规模分布及其发展态势 ..	45
4.1.2 调查显示：沪、苏、赣成为浙江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	48
4.1.3 深圳企业外迁的态势	49
4.2 典型地区投资环境比较	67
4.2.1 浙沪苏投资环境比较	67
4.2.2 闽东南地区投资环境分析	71
4.2.3 西部投资环境比较优势	75
第5章 企业总部迁移	88
5.1 相关概念的界定	88
5.2 企业总部区位选择及一般性条件分析	90
5.3 企业总部迁移的原因	93
5.4 企业总部迁移的风险	95
第6章 生产制造基地迁移	99
6.1 生产制造基地迁移的现象	99
6.2 厂商间的合作关系	101
6.2.1 厂商间关系的类型	101
6.2.2 交互依赖关系	105
6.2.3 信任与社会关系	109
6.3 生产制造基地迁移与供应关系的重建	111
6.4 迁移前后供应关系的联系	114
6.5 管理者在进行关系重建决策时应把握的要点	117
第7章 进入与退出企业集群	119
7.1 企业进入与企业退出	119

7.1.1 进入的界定	120
7.1.2 退出的界定	122
7.1.3 创建率与退出率	123
7.2 吸引力与排斥力	127
7.3 群聚成本与群聚收益	129
7.3.1 群落规模扩张的生态学解释	130
7.3.2 技术创新与厂商迁移	133
第 8 章 企业跨区扩张	138
8.1 企业跨区扩张的概念	138
8.2 企业跨区扩张的方式	144
8.3 企业扩张的阶段性	149
8.3.1 企业创立阶段	157
8.3.2 企业就近扩展阶段	159
8.3.3 企业跨区延伸阶段	161
8.3.4 失败或再创立阶段	163
8.4 企业跨区扩张与区域经济发展	164
第 9 章 企业迁移的引导机制	170
9.1 机制	170
9.1.1 机制设计理论	170
9.1.2 市场导向与资源导向	171
9.2 政府调控	176
9.2.1 政府宏观调控对企业迁移方向的影响	176
9.2.2 企业迁移对政府经济调控的适应	182
9.3 市场调节机制	185
第 10 章 浙江制造业厂商迁移的区位选择	192
10.1 相关术语界定	192
10.2 工业区位理论	195
10.3 区位影响因素	198
10.4 区位选择与泊松回归模型	207
10.4.1 随机效用极大化模型	207
10.4.2 假设与空间选择	209
10.4.3 条件逻辑斯蒂模型应用上的限制	210

10.4.4	泊松回归模型在空间选择上所扮演的角色	210
10.4.5	泊松回归模型应用上的限制	215
10.4.6	泊松回归模型的检定	215
10.5	浙江制造业发展概况及产业集群分布	217
10.5.1	浙江制造业发展概况	217
10.5.2	浙江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规模及分布	217
10.5.3	浙江制造业优势行业集聚状况的细化分析	221
10.5.4	各县(区)制造业优势化产业分析	227
10.5.5	浙江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主要特点	228
10.6	实证模型的建立	232
10.6.1	变量的选取与资料处理	232
10.6.2	实证模型	236
10.7	实证结果分析	237
参考文献		247

第1章 企业迁移概念与理论发展

本章概要: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以新建、并购、合作等方式,通过整体或者局部的空间位移在企业创办地之外实现迁移或者企业扩张的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市场追逐型迁移、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企业迁移决策是一种综合性决策,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市场越开放,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即使在同一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类型的企业,成本函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成本因素,有针对性地培育优势资源,是地区吸引更多企业迁入的重点。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主要有区位因素(拉力)、企业内部因素(推力)、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阻力)等。现有企业迁移研究采用的三种理论方法各有利弊,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制度和行为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企业迁移的研究方法需要动态化,企业过去行为的路径依赖以及企业和未来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用一个包含行为演化因素的动态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量存在的企业迁移现象。

1.1 什么是企业迁移

——关于企业迁移概念的理解

企业迁移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9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所谓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以新建、并购、合作等方式,通过整体或者局部的空间位移在企业创办地之外实现迁移或者企业扩张的模式。从迁移所涉及的规模和部门来分,企业迁移可分为整体迁移、总部迁移、职能部门迁移(如:研发机构、销售部门、生产基地等)、建立子公司等;从企业迁移的目的和原因来分,企业迁移可分为市场拓展型迁移、资源利用型迁移、环境吸引型迁移、资本运作型迁移等。

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来解决其发展速度与当地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来改善企业所处的软环境;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享受迁入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以此来降低企业的商务成本,等等。这些都是通过企业所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①。

企业迁移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企业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对环境的自

^① 刘娟. 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7(6): 61—62.

然选择,是国内经济秩序向着更合乎市场经济规则方向调整的必然结果,企业迁移的根本内在动因是通过企业所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浙江民营企业而言,迁移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和完善浙江和外地的经济分工关系^①。

刘怀德(2001)将企业迁移按照三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包括:

(1)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是一个存量和增量的概念。所谓绝对迁移,是企业将现有的生产经营机构、能力、研究开发力量等从一个地区移到另外的一个地区,而相对迁移,则是对增量的地区布局的调整,如新增生产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等布局,从而改变了企业的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

(2)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企业将其资源和活动部分地迁移,这是按照迁移的内容分类的。也就是说,企业将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构成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调整,生产型迁移是对生产能力的迁移,而知识型迁移是对企业的核心知识部门,尤其是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导力量的迁移,而管理型迁移是对企业的管理部门的迁移。

(3)市场追逐型迁移、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市场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是根据企业迁移的目标加以划分的。所谓市场追逐型迁移,是企业为了适应目标市场的变化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机构做出调整,具体而言,又可以包括:①更加便利和快捷地了解消费者需求;②通过与有着市场声誉的地区的结合,追求地区的范围经济,实现企业形象的提升。而成本降低型迁移,则是从生产经营成本的角度进行区域调整,包括: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保管成本、税收成本、资金成本、员工成本、土地和房屋使用成本等等。而政策追逐型迁移与市场追逐型和成本降低型迁移有很多相关之处,如政府管制政策给企业留下的生存空间大小、法制健全程度、税负的大小和收费规范程度等,它从市场和成本两方面影响企业。例如,在美国微软公司面对反垄断困境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向微软招手,表示微软可将总部搬到该省,以避免在美国被迫分拆的厄运,政府还开出优厚条件,包括提供贷款兴建新总部。因此,由于政策因素导致的企业迁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诱致性迁移和强制性迁移,前者是因为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支持,从而吸引企业迁移,追求来自政府收益的增加,而强制性迁移则是由于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压力,使企业不得不迁移,以降低来自政府的“剥夺”^②。

① 本书脚注部分如不特别说明,均表示相应内容的引用或资料来源。

② 刘怀德. 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迁移[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5):114—116.

1.2 企业要不要迁移

——几种理论观点的回顾

(1) 新古典区位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试图基于经济考虑构建一种寻找企业最优区位的一般标准的解释模型,其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homoconomics),并能获取完备的信息,而经济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并没有体现在上述模型中。在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利润空间”的概念十分重要(Hayter, 1999)。它定义了企业能够获取利润的空间,“利润空间”可能由特定区域的客观特征(如交通基础设施)决定,也可能受集群经济的影响,如专业化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地方生产网络,消费市场规模等,超越空间边界,生产成本将变得高昂或收益将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存。新古典区位理论认为,在均衡情况下,处于“利润空间”中的最优区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企业迁移也就变得没有必要。然而,企业和环境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企业内部因素可能导致扩张的需要或生产过程的变化;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如要素价格的变化,外部效应等)可能导致企业收益边界的变化,进而引起利润空间的改变。因此,有理性的企业会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区位,而当企业不再位于“利润空间”中,它就促使企业从当前区位迁移到新的区位,后者可能是有利润回报的区位(Pellenbargetal1, 2002)。此时,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推力因素,即促使企业离开现有区位的因素所驱动。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现有的区位仍处于“利润空间”之内,只是决策者发现其他区位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拉力因素,即吸引企业到其他区位的力量所驱动(VanDijk& Pellenbarg, 2000)。除了推力和拉力因素外,企业迁移决策还取决于一些促使企业留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如厂房、基础设施等)的损失、劳动就业关系的维持、地方政府的压力等。然而,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企业迁移决策只有在决策者具备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的假设下才具有说服力。由于上述假设,企业迁移成本,包括房地产选择和获取成本,现有设施的拆除、转移和重置成本,新设施的建设成本,新雇佣劳动力的招聘和培训成本等并没有考虑在内(McCann, 2001)。而且,企业内部发展因素(如企业扩张)作为导致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也没有考虑在内。此外,利润空间通常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变化不是很显著,因此,区位因素并不是企业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在19世纪6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区位的地理特征自然会造成信息的空间不对称,并且经济人在很多情况下会做出非完全理性的行为。事实上,由于受到信息不充分或信息收集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迁移并不一定会选择最优区位,而往往处于“准最优区位(suboptimallocation)”之中。

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关注企业迁移最优区位的选择以及外在区位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而对影响企业迁移行为的内在因素缺乏深入的研究^①。

(2) 决策者行为理论

Pen 和 Pellenbarg(1999)指出应从行为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决策过程和决策者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决策者行为理论对诸如生产成本、收益、价格和利润等客观经济标准不是十分关注,而是关注于创业者的决策过程。决策者行为理论认为区位选择是战略或长期投资决策的一部分,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主观的。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决策者的作用以及与企业迁移相关的决策过程(Hayter,1997)。该理论把企业看成是具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机构,决策过程通常受不完全信息、主观解释以及其他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情形的影响。因此,企业迁移对区位的选择并不总是最优的。决策者行为理论更强调内部因素和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如 Simon(2000)指出一个决策者由于个人能力,并不能收集和掌握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满意人”(Satisficer Person),通常会选择次优区位,而最优区位决策只是理论抽象而已。决策者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如何感知、编码、评估那些影响感知和选择过程的信息和因素。

(3) 制度理论或演化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和行为理论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因为它们都把企业的决策行为置于静态的环境之中。经济活动是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99,2008),而不仅仅是企业行为。制度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特定环境下企业之间的联系而非单独企业的行为,强调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货物与商品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而且包括与创业者、顾客、公共机构等之间的非正式网络。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决策,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人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企业迁移行为是企业投资战略的结果,也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谈判协商的结果(Pellenbargetal,2002)。该理论认为“外部”或“制度”要素(空间调整,如扩张、兼并、收购、接管、信任、互惠、合作和惯例)在企业的结构与功能、市场的运作以及政府干预形式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Martin,2000)。企业迁移的演化理论应用达尔文的生物学概念,如变异、选择和路径依赖来分析空间经济发展(Nelsonand Winter,1998)。这种演化概念在经

^① ①杨文兵.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07(2):137—140.②白玫.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5(8):83—87.③陈伟鸿 王会龙.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脉络[J].经济评论,2007(3):124—128.

济地理中也分别被称作创新、竞争和惯例。克鲁格曼(1991)认为在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偶然性、路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起决定作用。一旦早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以后,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可产生累积效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在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具有“锁定”(lockin)效应。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对于企业迁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先前的区位对企业迁移决策以及迁移路径具有强烈的影响,企业的初始区位将限制可能的迁移选择,新的区位通常位于初始区位的附近。路径依赖或惯例使创业者不愿进入他们缺乏经验的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如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Brons and pellenbarg, 2003)或者改变区位。他们倾向于通过过去在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知识,惯例和能力来展开竞争,并且这种能力很难被别人模仿(Boschma and Frenken, 2004)。因此,创业者更容易依赖在特定市场领域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而忽视其他收益较高但同时也潜藏着风险的发展路径,这很容易导致“锁定”和次优行为的发生。此外,演化理论中,经济变化与对变化的抵制或惯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并不能选择新古典理论中所谓的最优区位,受历史行为的影响,如沉没成本、信息偏差和感知等,限制了它们的最优选择(锁定效应)。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成一个“黑匣子”,以理性的方式应对环境的变化;行为区位理论中企业是涉及冲突,不确定性,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决策主体;而制度和演化理论中,企业被认为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从新古典区位到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转变也意味着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典型的“硬”要素向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软”要素的转变。促进核心至边缘迁移的政策措施属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成本节约要素。相反,行为区位理论强调软要素(如企业的个性考虑)的重要性,如在决定是否迁移时,非完全信息使较远的区域变得未知,更容易迁移到较近的区域。此外,制度和演化理论强调企业行为受不确定环境中提供决策依据的惯例和制度的影响,非物质要素如信任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作用显著。上述理论是相互重叠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Brons and pellenbarg, 2003)^①。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迁移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决定因素可归纳如下,如表 1.1 所示。

^① 白玫. 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J]. 经济学动态, 2005(8)

表 1.1 企业迁移理论流派及其决定因素

理论框架	主要概念、要素	优点	缺点	迁移成本
新古典区位理论	市场情况、成本节约(区位要素)	区位要素(拉力); 迁移动机(推力); 最优行为	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企业内部过程(成长)研究缺乏	无
行为区位理论	信息、能力、感知、愿景(内部要素)	非经济拉力和推力因素:有限信息、有限理性、感知和不确定性;满意行为	强调描述性而非解释性模型;企业内部过程研究仍然缺乏;低估经济要素影响	有
制度或演化理论	网络、信任、社会资本(制度要素);路径依赖、惯例(外部要素)	非静态的环境;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联系;历史行为;路径依赖	实证研究缺乏	有

资料来源:根据白致(2005)研究成果整理。

1.3 企业为什么要迁移

——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

企业迁移决策,是一种综合性决策,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市场越开放,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即使在同一地区,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类型的企业,成本函数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成本因素,有针对性地培育优势资源,是地区吸引更多企业迁入的努力重点。(刘怀德 艾斌,2005)

1. 成本最小化

成本最小化是许多企业迁移的主要考虑因素,这里的成本采用商务成本的概念。商务成本由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其它成本三者构成。要素成本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包含土地价格、水电价格和人力要素价格等;交易成本主要包含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企业承担的税费、政府运作的效率等;其它成本是指除前面两个方面之外的成本,包含企业融入当地的难易程度(文化兼容程度)、社会治安状况和员工的可迁移性等。一般来讲,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主要追求商务成本的最小化。

(1)要素成本最小化。浙江企业迁往江苏主要原因就是追求要素成本的最小化,上海、昆山的要素成本(以土地为例)显著的低于浙江和珠三角地区(见表1.2)。

表 1.2 要素平均成本

	昆山	上海浦东区	宁波	温州	顺德
土地出让价格(元/亩)	80000	80000	135000	400000	142000
工人工资(元/月)	1000	1803	1386	1527	1150
管技工资(元/月)	2000	1705	2705	2700	
平均电价(元/度)	0.53	0.78	0.63	0.68	0.71

资料来源:①《工人日报》2004-08-29;②温州市统计局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交易成本最小化。部分台商企业将在珠三角的工厂迁往长三角的苏州,税收优势就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因素。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 15% 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但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城市都已经突破了国家的底线。例如:

苏州新区:经营在 10 年以上,从开始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减免期满后,先进技术再延长三年,按 10% 征收,企业出口产品值达到企业产品产值 70% 以上,按 10% 的税率征收。

苏州工业园:经营期超过 10 年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通过“先征后返”方式。可享受“两免三减半”;先进技术企业可享受“两免六减半”;产品出口企业可享受“两免全减半”的优惠。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品出口型企业,按规定减免所得税期满后,所得税率按 10% 征收,先进技术企业实行“两免六减半”的政策,期满后按 10% 征收。

宁波:所得税税率为 15%,实行“五免五减半”。台商企业就在这些政策中选择最优者作为企业的迁入地。这也造成了各地招商的无序竞争现象。

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工作效率。浙江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是由于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它们很难享受特别的政策待遇。但倘若他们到外地投资,由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它们往往被奉为上宾,无论在费用减免还是在土地征用速度等方面都享受特别待遇,且当地领导经常听取企业意见,征询发展要求,故政府工作效率很高,交易成本也比浙江低。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商务成本具有优势的地区(昆山、上海)一般是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的目的地,迁移实例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2. 资源充裕化

与企业迁移有关的资源主要指社会资源,包括品牌、资金、消费者市场、信息、技术以及人才等。一般来看,企业迁移看中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迁入地的地区资源优势(全国性的品牌资源、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广阔的市场、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等),企业正是利用迁入地的这种资源优势来实施自身的经